

# 历史



# 转折中的

●佟静 著

# 张闻天

中国 青年 政治  
学 院 学 术 丛 书

# 历史



国防大学 2 071 2753 5

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学术丛书

# 转折中的

●佟静 著

# 张闻天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1 2753 5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转折中的张闻天/佟静著.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0

ISBN 7-80098-442-7

I. 历… II. 佟… III. ①张闻天(1900~1976)-生平事迹②张闻天(1900~1976)-人物研究 N.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4151 号

责任编辑: 湘仁 封面设计: 燕童 责任校对: 钱玲娣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万寿路西街甲7号 邮编: 10003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62千字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

ISBN 7—80098—442—7/D·329 定价: 18.00元

本社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引 言 .....	( 1 )
<b>第一章 不称总书记的“总书记” .....</b>	<b>( 3 )</b>
一、初步走出“左”的樊篱 .....	( 4 )
二、从“博洛矛盾”到“毛洛合作” .....	(13)
三、最高“三人团”和中央队“三人团” .....	(24)
四、停止李德的指挥权 .....	(27)
五、遵义会议上的“反报告” .....	(31)
六、在中央“负总责” .....	(37)
七、新的中央“三人团” .....	(42)
<b>第二章 长征路上反分裂 .....</b>	<b>(48)</b>
一、北上与南下之争 .....	(49)
二、谁代表中央? .....	(54)
三、危急时刻,断然北上 .....	(59)
四、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	(64)
五、反对西进 .....	(69)
<b>第三章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b>	<b>(74)</b>
一、解决“刘志丹事件” .....	(74)
二、喜结良缘 .....	(79)
三、“打通国际路线” .....	(83)
四、主持制定新的策略路线 .....	(85)
五、为巩固扩大根据地奔忙 .....	(91)
六、把党的政策宣传到国外 .....	(97)
<b>第四章 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b>	<b>(103)</b>
一、再反“关门主义” .....	(104)
二、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	(107)

三、丰富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	(108)
四、制定新的统一战线政策 .....	(110)
五、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	(115)
<b>第五章 领导土地政策的转变</b> .....	(121)
一、共产国际“七大”精神 .....	(121)
二、“改变对富农的策略” .....	(124)
三、推行减租减息 .....	(129)
<b>第六章 致力恢复白区工作</b> .....	(133)
一、白区工作方针的转变 .....	(133)
二、加强北方局工作 .....	(136)
三、指导上海地下党的工作 .....	(140)
四、制定白区工作的新策略 .....	(144)
五、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的形成 .....	(147)
六、白区工作会议的召开 .....	(150)
<b>第七章 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b> .....	(155)
一、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	(156)
二、和平调停决策的提出 .....	(161)
三、再次拒绝共产国际的错误意见 .....	(165)
四、密访西安 .....	(169)
五、联蒋抗日与全民抗战 .....	(173)
<b>第八章 坚决抵制王明右倾投降主义</b> .....	(178)
一、“何鸣事件”引起的思考 .....	(178)
二、“十二月会议”上的较量 .....	(184)
三、“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再较量 .....	(187)
四、用行动反对王明右倾错误 .....	(191)
五、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	(197)
<b>结束语</b> .....	(202)
<b>主要参考资料</b> .....	(205)

## 引 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犯过错误的领导人中间,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始终坚持错误,至死不改,王明、张国焘就是两个典型;另一种是一度犯过严重错误,但可贵之处,就是能够从错误中总结教训,坚决改正,使自己更加聪明,从而走向正确。张闻天就是其中令人尊敬的一位。

20世纪30年代,张闻天在中共中央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先是临时中央的重要成员,同博古一起推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遵义会议之后,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往往只知道其犯过“左”倾错误之过,而对其纠正“左”倾错误,帮助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历史功绩,则知之甚少。

张闻天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在党内曾经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935年至1938年,即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党的历史的重要转折期,也是张闻天个人历史最为辉煌的时期,是他最有政治作为的时期,是他在党内作用的顶峰时期。因此,研究张闻天这几年的思想轨迹和政治活动,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张闻天研究的课题本身。



## 第一章

# 不称总书记的“总书记”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决议》是这次会议的最主要的文件。它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指导，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是在全党、全军开展与深入进行“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和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如果说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总导演的话，那么张闻天就是这次会议的领衔主演：这表现为他是会前“提纲”的拟定人，是会上“反报告”的发言人，还是会后《决议》的起草人。由此看来，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张闻天从“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到“左”倾路线的重要“终结者”的转变，有较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经历了几年的艰苦探索。



## 一、初步走出“左”的樊篱

张闻天虽然没有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但从1931年党的四中全会以后曾经是“左”倾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推行过王明“左”倾路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张闻天不是一个完人，但他却是一个伟人。同其他犯“左”倾错误的人相比，张闻天觉悟得早，摆脱得快，改得彻底。对此，毛泽东、周恩来都曾给予肯定。

中共“七大”期间，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曾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他还说，由于他们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所以作用很大。为此，毛泽东要人们绝不要忘记他们。1960年7月16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谈到遵义会议时也说过：那个时候，开始是张闻天转得快，王稼祥先转了，张闻天也先转了。毛泽东、周恩来都对张闻天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张闻天，上海南汇人。早年在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至1923年，先后赴日本、美国学习和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苏联学习，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当时俄文化名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伊思美洛夫，别名洛甫由此而来。1931年1月，张闻天结束了整整五年的留学苏联的生活，与杨尚昆结伴踏上了归国的路程。他们历尽艰辛，终于在2月17日到达了阔别已久的上海。到达上海的那天，恰巧是辛未年的大年初一。不久，张闻天、杨尚昆就通过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学陈昌浩与博古联系上了。从9月开始张闻天被指定为临时中央的主要成员，与博古有一段时期合作。

这时，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

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植下，已经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一名重要成员，在组织上取得了党中央合法的领导权。王明有些脱离中国实际的书本知识，就以“理论家”自居，发表文章，写小册子，高唱“百分之百地执行国际路线”的调子，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他不是反对李立三“左”的错误，而是指责立三是“左”的词句下的“右倾机会主义”，从而提出了比李立三更“左”的许多错误观点。这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

当时中共的党内斗争十分激烈，白色恐怖也异常严重。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将瞿秋白等以“调和路线错误”的罪名排除在中央领导之外，而反对四中全会的罗章龙、王克全等人，走上了分裂党的道路，有的被开除出党，有的被逐出领导机构。另一批反对四中全会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等党的重要干部，则由于叛徒唐虞的告密于1月17日被捕，2月7日在龙华英勇就义。

从1931年3月2日起，张闻天开始以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接着他又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和苏区委员会负责人。张闻天上任以后，主编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红旗周报》，撰写文章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张闻天工作勤奋，思维敏捷，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在《红旗周报》等党的报刊上发表了10多篇文章，分析政治形势，揭露帝国主义，抨击南京政府，指导党的工作。其中已显露出某些“左”的观点。

在临时中央时，张闻天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两个主要的方面：

一个主要方面是照搬照抄斯大林的公式，把中间派别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采取揭露、打击的方针。张闻天1931年10月26日写的《满洲事变中各个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一文，可以说是一种“左”倾错误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方面笼统地认为国民党内部各个派别主张召开“和平会议”，成立“统一政府”，不

过是为了“用这种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来团结他们的内部，以镇压革命”。另一方面，张闻天又对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如“国家主义派”、“新月派”、“社会与教育派”、“托陈取消派”等及其代表人物逐个点名予以严厉批评，一律说成是“反革命的在野派”，说他们对日“宣战”与成立“国防政府”的主张，“实际不是为了对付日本，而是为了对付革命民众”，是“为了欺骗民众，来维持中国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把他们看做“最危险的敌人”。

另一个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张闻天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重复共产国际对于革命形势的过高估计，执行“反右倾”的错误方针。他严厉指责以至无情打击党内对于“左”倾观点持不同意见的组织和个人。其中1932年4月初以社论形式发表的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可以说是这方面错误的集大成者。这篇文章认为：革命斗争“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走向崩溃，使中国革命危机更加成熟”，因而应该采取“进攻”路线，“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

由于“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张闻天逐渐醒悟，他开始努力摆脱“左”倾错误的束缚。

在《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张闻天明确提出了“党八股”的概念，对在“左”倾错误统治下的宣传工作进行了抨击。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宣传“往往是死板，千篇一律的、笼统武断的。我们在这一方面缺乏具体性、时间性、缺乏忍耐的解释与具体的证明的工作。我们同志在这一方面的特点，就是‘党八股’（又名‘十八套’）。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话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为止。我们不管群众是否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却必须把所有的‘十八套’完全吐露出来，方才痛快。像这样的宣传鼓动，当然没有法子动员广大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正确的做法是：“要能动员广大群众到

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首先必须提出群众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迫切要求，抓住这些具体要求来动员群众参加斗争。”

1932年10月27日，临时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张闻天将“左”倾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严重的问题提了出来。他指出：“党内‘左’倾情绪的增长，自北方会议后，的确值得我们注意的。”在作“结论”时，张闻天又进一步指出：“在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容易发生的。”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将临时中央自身工作中的错误，作为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提了出来，这在张闻天之前还没有过。

所有这些，也就预示着张闻天终究要同“左”倾错误分道扬镳！

1932年底，张闻天离开上海“临时中央”，绕道汕头于1933年1月中旬到达瑞金。与此同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江西瑞金。

进入瑞金后，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张闻天出任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但这时的他已经不再那么盲从了。张闻天在火热的斗争第一线，在实际工作中重视调查研究，加强自身锻炼，逐步从“左”倾路线中摆脱出来。

初到中央苏区的张闻天，对于眼前的一切还不完全熟悉和适应，因此他依然在“左”倾错误的阴影下徘徊。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参与领导了1933年2月中旬开始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的党内斗争。张闻天不仅发表文章指责“罗明路线”，而且在行动上还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分别于2月与3月赴福建的汀州和江西的会昌、寻乌、安远，直接领导了这些地方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苏区得到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大约持续了半年光景。在此期间，张闻天在中央局常委内分工主管政府工作，研究解决根据地内各类方针政策问题。由于较多的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张闻天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逐渐

觉察到“左”的错误，对“左”倾的具体表现有所纠正，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主张。

1933年4月，在对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一年半来实施情况进行总结时，张闻天撰写了《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一文，明确地批评了苏区的“左”的劳动政策。他在文章中认为《劳动法》机械地用大城市的一套，严重脱离苏区实际，执行的结果是师傅带不起徒弟，业主负担不起职工“福利”，实际上是“把资本吃完了再说”的政策，其结果“必然使苏维埃经济凋零，使工人失业，使工人的生活恶化”。他提出，“必须同那些不顾任何情形企图完全机械地执行劳动法的‘左’的倾向做斗争”。

在张闻天与陈云等的提议下，《劳动法》作了修改，改变了某些脱离实际的“左”的条文。因此，可以说张闻天对《劳动法》的批评，是他摆脱“左”倾樊篱的一个突破口。

如果说对《劳动法》的总结只是从某项具体政策入手否定一些“左”的政策，那么，张闻天在此后写成的《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就是对根据地经济构成和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全面论述。

张闻天首先明确了苏区进行经济建设的基本目的。当革命战争始终是中心任务时，忽视经济建设就成为一个带普遍性的倾向。为克服这一倾向，张闻天指出，在苏区，党的任务是集中一切经济力量实现三个目的：一是在经济上帮助革命战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二是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并在经济上巩固与他们的联合；三是在经济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造成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和优势。这说明张闻天把进行经济建设和赢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政权紧紧地联系起来，把搞好经济建设和加深人民群众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信赖与争取社会主义的远大前途联系起来。

为了发展苏区经济建设，张闻天具体分析了当时苏区的各种经济成分，并在发展中考察它们的地位、作用。他指出，在苏区，地

主经济在土地革命后已经“完全消失”；农民的小生产的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小手工业“占着主要的地位”，它的发展“应该引起我们很大的注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比较不重要”，其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利的”；小生产者的集体的合作经济“正在向前发展中获得更为重要的意义”，它“目前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但“带有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国营企业“还限制于苏维埃政府必要的军事工业、造币厂与印刷厂方面”，当然“带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其中有重大意义的是“国家银行和各种经营的组织”；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可以说还没有”。对苏区各种经济成分的认识，是张闻天提出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可靠依据。

在明确了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后，张闻天提出应当采取的方针，这就是实行发展生产、鼓励流通的方针。他指出：“我们党的任务是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为此，“首先必须尽量扩大苏维埃的生产，提高土地生产力”。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应该成为千百万农民群众经济生活的组织者”，要通过“种子、肥料、耕牛、耕具的解决，荒田荒地的开辟，生产队的组织，生产特别是有成绩的农民的奖励”，通过组织“春耕夏耕以及秋收等运动”，“来达到土地生产力的提高”。随着发展生产而来的是商品的流通问题。张闻天指出，苏维埃政府的方针“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他还提出扩大消费合作社，加强粮食调剂局，设立运输站等措施，“以便商品的流通”。为了打破敌人对于苏区的经济封锁，主张“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要尽量利用苏区内外的商人，给他们以特别的好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闻天鲜明地提出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正确政策。文章论证资本主义在苏区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他写到：“工商业的发展，苏区内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即是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我们并不反对，“并且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当苏维埃政权没有力量经营

国有的大企业，那末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不能不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闻天提出了苏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一是“利用”，即“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来发展苏区经济。张闻天主张“使用许多办法来吸引与鼓励资本家的投资”。对于商人、老板、富农，“还应该利用‘利诱’与‘让步’的办法”。

二是“限制”。所谓限制，就是苏维埃政权“经过劳动法来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来防止资本家利用企业进行反革命活动；“征收累进的工业税和商业税”来限制他们的利润。

三是“竞争”。具体的做法是借助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国家银行”，来“帮助国家企业与合作社的发展，使这些企业同私人资本做竞争”。

四是“斗争”。对于“资本家的投机，故意高抬物价，以及扰乱苏维埃经济，使群众生活恶化的企图”，苏维埃政权则应采取最严厉的办法来对付，包括“用武装的威吓、压迫、没收与征发”。

张闻天的上述思想，对苏维埃经济建设地开展起了促进作用，使红色区域的农业生产有了发展。据统计，1933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1932年增加了15%（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20%。手工业和个别工业“从1933年上半年起，开始走向恢复”。在一些地区“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也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到了成效”。此外，商业、对外贸易也都有所发展，增强了苏区的财力物力。

在政权建设方面，张闻天提出了发展苏维埃民主的任务。他尖锐地指出，在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对发展民主“这一根本问题的无知与错误的了解”，他们只看到工农民主专政的“权力”的方面，而看不到“民主”的方面。他认为，苏维埃的民主的“中心任务，是在吸收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政权，教育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为此，“绝不能容许”“对于群众的强迫命令现象”，而应该“利用说服

与教育的办法”，“有最大限度的耐心”，进行“群众的动员”，还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对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运动，张闻天也提出了有系统地发展民主的具体意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还针对当时的实际，就党政关系问题发表了精辟的意见。他认为党内对苏维埃工作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直接下命令给苏维埃，要苏维埃执行党的命令。甚至在县苏、区苏会议上，党的县委或区委书记直接出席做报告，决定县苏或区苏工作。”另一种“是党根本不理苏维埃的工作，把苏维埃的工作当做无关紧要，甚至把党内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都往苏维埃政府送”。为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张闻天提出了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应该“经过（不是代替也不是命令）苏维埃，经过群众的政权机关，来实现党的领导作用”。这可以说是党内关于正确处理党政关系，避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最早的重要论述之一。

在党群关系方面，张闻天也较为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为了转变领导作风，克服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密切党同群众的关系，张闻天发表了多篇论述领导方式的文章，认为新的领导方式的基本内容，是要“解决党与群众的关系与党怎样领导群众的问题”，其要点是：一要“细心地，耐烦地去说服群众”；二要“正确地去代表群众的意识”；三要“负责地谨慎地去领导群众”。

显然，张闻天所阐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同“左”倾教条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然而，在当时战争环境中，在“左”倾路线统治下，这些主张很难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全面贯彻执行。张闻天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力纠正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等恶劣作风。1934年2月，江西万泰县发生一起数千群众逃跑事件，张闻天立即写去指示信，不同意万泰县领导人将群众逃跑的原因归之于受敌人的欺骗，认为事件主要原因是县政府领导在扩红和征粮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摊派与强迫命令”。



关于文化教育，张闻天写了《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一文，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他批评了那种将革命战争与文化教育对立起来的“取消”文化教育的观点，也批评了那种将苏区的文化教育仅仅降低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看法。他明确指出，我们发展文化教育“是为了工农群众更好的管理自己的国家”，“是革命战争伟大胜利的必要条件”。他深刻地点明，官僚主义产生与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人民群众文化教育程度的“落后”。张闻天在提出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开展社会教育、培养工农知识分子、造就专门人才任务的同时，着重论述了利用旧知识分子的“绝对必要”，严肃批评了“‘左’的空谈拒绝旧的知识分子的利用路线”。这同当时通行的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是针锋相对的。为了推动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张闻天签发了《小学教员优待条例》，这一条例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优待教师的重要文件。

对于干部教育，张闻天也很重视。他曾亲自兼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相当于中央党校）校长，不仅多次到该校演讲，而且还在该校系统授课。1933年4月9日，张闻天在该校演讲后，提议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一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应运而生。1934年1月出版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就是他讲课的记录。1934年4月1日，“沈泽民苏维埃大学”（简称“苏大”）举行开学典礼，张闻天出席并发表演说，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课程教育学生”，学生要“学习领导革命战争”，“学习改善群众生活问题”，“学习怎样管理苏维埃政权”。他所规定的办学方针和教学内容是切合实际的。

对于中央苏区实行过的肃反政策，张闻天也是持批评态度的。解救傅连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傅连璋原是汀州福音医院院长，1927年就治疗过大批南昌起义部队中的伤病员。1933年将福音医院全部设备转到苏区，全家也搬到了瑞金，并把自己的私人积蓄全部交给了党。然而在肃反中他却被诬陷为AB团、社会民主党，以